



Cultural treasures unearthed

遺珍

紹興縣文物保護單位解讀

紹興縣文化發展中心 編

越地遺珍

丙戌秋杪 鮑賢佐 九於西子湖上



紹興縣文物保護單位解讀

遺珍



越

Cultural treasures unearthed
in Shaoxing Count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地遗珍/绍兴县文化发展中心编.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735-155-9

I. 越… II. 绍… III. 文物-简介-绍兴县

IV. K872.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6881号

责任编辑: 汪志强

责任出版: 李 兵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解放路马坡巷39号 (邮编: 3100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8

印 张: 14.75

印 数: 00 001-01 000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5-155-9/K · 156

定 价: 780.00元 (上、下册)



越地遗珍

——绍兴县文物保护单位解读

Cultural treasures unearthed
in SHAOXING COUNTY

题 签：鲍贤伦

策 划：诸剑明

主 编：冯 健

副 主 编：陈五六 金柏创

撰 文：陈五六 金柏创

陆菊仙 宋又红 姚剑敏

摄 影：林子龙

装帧设计：陈 楷 娄国海 王 瑜

监 印：娄国海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序

Foreword

002

概述

Outline

008

古遗址

Ancient ruins

010

古墓葬

Ancient graves

024

石刻及造像

Stone carving and statues

048

古建筑

Historic buildings

066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Major historic sites and buildings in the modern times

198

后记

Postscript

230

序

《越地遗珍》的编集、精印、出版，不仅是越地考古、文物史上值得额手称庆的大事，更是海内外越籍人士引颈企盼的巨构。绵绵越史，其中包含着多少传说与神话，这种现象是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普遍存在的。而《遗珍》却不同凡响，是一部以实物为证的信史。特别是对于远古，真是价值连城。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这是太史公对史学的不朽定义。他撰述《一百三十篇》，彪炳千秋，成为我国史学文献上的不朽成果。他的治学方法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前者是实践，就是身体力行；后者是博览，就是言必有据。对于行万里路的做学问方法，他在青年时代就有所作为。《自序》中有一段话说：

“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湘沅，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从这段话中，按地图索骥，他二十岁的这次出行，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语言虽然简单，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旅行，并不是赏山玩水，而是一种“游学”。他所到之处，都有其为学的目的。譬如“上会稽”，当时的会稽还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蛮貊之地，但是为了“探禹穴”，就不避道路艰难，因为对于九州山川，他崇信《尚书·禹贡》。他“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因为对于行事为人，他毕生尊孔崇儒。

《自序》中记叙的这段“游学”经过写得十分简括，只是表达了他青年出行的主要宗旨。但正是因为他的旅行实践，所以才能在《一百三十篇》中写下《货殖列传》这样一篇高瞻远瞩，阅中肆外的文章，全文记叙精辟，议论阔达，创人文地理之先河，是全国总志的鼻祖。他年轻时代的这一次“游学”，除了上述《货殖列传》中对人文现象的观察以外，其实也考察了各地的自然景观。《河渠书》中有一段文章可以为证：

“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②；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瞩岷山之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所以他的这次旅行，事前是作了周密计划的。从自然地理领域来说，他登名山，涉大川，不仅考察如离碓之类前人修建的水利工程，以后又参加了元封二年（前109）由汉武帝亲自领导的在瓠河口负薪堵决的实践，从而开创了正史《河渠志》的体例，写下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千古名言：

“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以上都是他行万里路的治学成就，旅行的本身就是读书，所以他的旅行属于“游学”。除了通过旅行做学问以外，他读万卷书的功夫也确实弥深弥笃。《自序》中有“年十岁则诵古文”的话。有人附会此“古文”为“孔壁古文”，但“孔壁”故事出于汉武帝末年，“年十岁”怎能读到？此“古文”显然是先秦用古文书写的散体文，后来都已亡佚，但数量估计很大。《自序》中还记及他钻研几种重要典籍的经过：“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当然不可能将其所精读深研的文献都写出来，《天官》、《易》、《道论》之类，不过是可见一斑而已。当然，读万卷书也正和行万里路一样，他不仅博学笃行，而且慎思明辨。也就是说，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二者是彼此对比，相互参照的。用现代的治学语言来说，就是田野考察与文献研读必须相辅相成。他的田野考察如上所述不仅幅员辽阔，而且观览精详。同样，他的文献研读，也是谨慎严密，细分缕析的。《大宛列传》中的一段结尾，充分体现了他读万卷书的认真不苟：

“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他凭什么对当时的这些著名文献提出“不敢言之也”的批评？其依据就是田野考察。不是他自己的田野考察，而是张骞的田野考察，因为他确信张骞的目击纪录是可靠的。这就是他所指出的：

“《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以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

太史公是我国史学研究的开创宗师，尽管由于时代的嬗递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百三十篇》之中，有不少现代人看来不是信史的作品。例如他所说的张骞“穷河源”，其实不是黄河河源，而是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的河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传袭的“黄河重源”^③的错误。尽管到唐朝已有学者指出此说的错误，但直到清代仍然有人深信不疑^④。所以像这样一类的错误，属于瑕不掩瑜，实在毋庸计较。但他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定义与他所遵循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史学研究方法，却是后世史学界并包括一切做学问的人应该切记和奉行的准则。

《一百三十篇》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若从现代历史科学进行评价，“黄河重源”不过是件小事，其他更大的错误也是不少的。太史公把不少当时的传说甚至神话都写入其中，譬如《夏本纪》，他不仅记叙夏的世系和禹的伟大，并把《禹贡》全篇录入，这正是他为什么要“上会稽，探禹穴”的原因。但顾颉刚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揭示了：“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⑤。而《禹贡》一篇，学术界也已基本论定是战国后期的作品。更有甚者，由于上世纪末，我国某些人玩了一个被邹承鲁院士称为“大钱不评”^⑥的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招来了《远东经济评论》（2000年7月20日）和《纽约时报》（2000年11月10日）的议论，因而引发一场国际网上大讨论。由于网上讨论用英文进行，国内多数学者都不知情。《中国文物报》曾在2001年6月6日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为题，用一整幅版面介绍了这次网议的要点。这个版面的主持人刘星，在全文最后的一个小标题《这场争论引起的若干思考》中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

“关于是否有夏、二里头是否夏以及二里头文化是否步入国家社会等等问题，我们在上述的讨论中已经多少表明了我们的立场。运用‘同代文字证明’的逻辑，我们只能对夏的存在打一个问号。因为目前还没有出土文字证明司马迁关于夏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

我在《绍兴史纲序》^⑦中，对《中国文物报》的最后结语也作过一点评论：

“我真佩服刘星先生的这段话，他确实说得既科学，又含蓄。‘因为目前还没有出土文字证明司马迁关于夏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所以‘我们只能对夏的存在打一个问号’。司马迁对夏说了些什么？《夏本纪》中抄录了《禹贡》全文，这里记录了大禹移山倒海的神功，竟把第四纪甚至第三纪的地质变迁都包罗在内。”

我们当然不会把“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荒唐的游戏和《一百三十篇》中的《夏本纪》相提并论。汉武帝不是一位愚昧无知的领导，司马迁也没有从他手上捞到一个“红头文件”和大笔钱财，他是在身受腐刑以后的困厄处境中从事这种写作的。在那个时代，把传说和神话当作信史属于情有可原。这和太史公以后过了二十个世纪，对“年”的数值计算如此精确的时代^⑧，竟然异想天开，创造“夏商周”的神话，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任何一门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都是随着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而不断更新的。司马迁崇奉的禹，过了二十个世纪，顾颉刚认为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顾氏假设提出以后十年，赞同此说的冀朝鼎，认为产生禹和洪水传说的背景是“钱塘江的洪水灾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治水的迫

切要求”^⑨。顾颉刚提出的假设与冀朝鼎的附和及推论，都是值得称赞的。我在《大禹研究序》^⑩中说：

“我平生十分佩服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在相关学科还比较落后，利用相关学科的成果和资料都比较困难，却能依靠自己的优厚天赋和非凡勤奋，依靠自己的观察、实验、思考，提出当时让人大吃一惊而事后逐渐获得证实的假设、学说、理论的科学家。”

顾颉刚就是这样的科学家，冀朝鼎也是一样。他们假设禹的神话起因于洪水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把洪水来源发生于钱塘江却是附会的。钱塘江的“水波恶”即现在所称的涌潮是事实，但这不是构成禹的神话的原因。聪明人的错误，问题就出在我前面所说的“相关学科”。因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这个课题的相关学科还相对落后，还不可能为顾颉刚的假设提供正确的证据。而像顾氏的这一类假设，必须依靠多学科的共同论证。

记得1989年我在日本广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广岛附近包括北九州的不少大学，都利用这段时期邀请我讲学。日本南部的最大媒体《中国新闻》（因广岛在日本的大区域中属于“中国地方”），不仅刊登了我们夫妇到达广岛的消息，并且披露了我在广岛大学以外的其他大学中的若干讲题，如《中日两国的史前文化交流》、《吴越文化是中日两国的共同文化》等。这些讲题让九州佐贺电视台台长内藤大典感到很大的兴趣，特地赶到广岛邀请我们夫妇去访问佐贺市内一处称为吉野里的弥生代遗址。这处遗址发现于1986年，当时正在进行恢复。我多次去日本讲课，一直是应他们的要求使用英语，但那一次对方显然是为了编制电视节目的需要，采用了由电视台记者用日语提问，由我夫人译成汉语；我用汉语答复，再由我夫人译成日语。所以一小时可以完成的事，却花了两个多小时。提问完毕，我们身边已聚集了十多位从各地赶来的记者。他们的兴趣并不在编制电视节目而是研究学问。时间已近薄暮，但他们还不断提出问题。总括他们的问题，主要是：“像吉野里这样的遗址，你作为一位历史地理学家，应该怎样进行研究？”虽然彼此都用英语交谈，不花很多时间，但是时间已经很晚，电视台长又催促我们前去进餐，所以我的回答显得匆忙简略。回国以后，我曾把这天与日本记者的谈话整理成一篇题为《多学科研究吴越文化》的文章，曾在中国和日本的几处刊物发表，最后收入于我的论文集《吴越文化论丛》^⑪中。我在此文中指出：

“这类课题，过去常由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从事研究，现在看来，单靠这些学科恐怕也不足以获得全面和正确的研究结论。应该组织更多的学科，如地质学、地史学、第四纪学、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地名学、语言学等等学科，共同来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要努力跳出一些旧的窠臼，而尽量利用新的科技成果，如放射性碳素测年、热释光测年、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卫片判读、泥炭层的勘查测定，贝壳堤和古海岸的勘查测定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主观臆测，获得客观的和有科学依据的结论。”

我在文内所说的“应该组织更多学科”，其实就是当年顾颉刚在提出他的假设时还无法凭藉的“相关学科”。在顾氏以后不过三四十年，第四纪学就揭示了晚更新世以后中国东部沿海的几次海进和海退过程，并且利用贝壳堤进行科学测年，让我们获得了每个时代的海岸变迁和海面高程数据，我才能撰写《史前漂流太平洋的越人》^⑫一文，并且通过考证绘制距今二万多年前的《假轮虫海退时期今浙江省境示意图》^⑬和距今七千年前的《卷转虫海进时期今浙江省境示意图》。由于相关学科的发展，顾颉刚假设的不足之处得到了确证。

我在《越族的发展与流散》^⑭一文中指出：

“越族居民在会稽、四明山地的山麓冲积扇顶端，俯视这片茫茫大海，面对着这块他们的祖辈

口口相传的，如今已为洪水所吞噬的美好故土，当然不胜感慨。他们幻想和期待着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明，能够驱走这滔天洪水，让他们回到祖辈相传的这块广阔、平坦、富庶美丽的土地上去。”

这位“伟大的神明”，终于降临神迹，这就是距今五千多年前开始的卷转虫海退。“神禹”拯救了在会稽山区刀耕火种了几千年的越人，让他们从这片山荒土瘠的困境中出来，到一片“神禹”恩赐的泥泞沼泽上栖居生产。从《禹贡》和《夏本纪》以后，经过了漫长的二千多年，禹的神话才在历史学以外的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中获得了解读。想当年，太史公实在是孤军作战。但是，《禹贡》和《夏本纪》虽然是个传说和神话，而它们在团结中华民族的过程中，一直起了重大的作用，至今仍然在海内外华人中发挥了强大的凝聚力。《一百三十篇》中尽管记叙了不少先秦的神话故事，但它仍然而且永远是我们的民族财富，太史公也永远是我国历史学的伟大先驱。

现在回到《越地遗珍》的本题。我在此《序》开头就给《遗珍》作了很高的评价，称它是“以实物为证的信史”。“以实物为证”，这句话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信史”一词有极重的分量。清乾隆创修《四库全书》，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⑮，“正史”在我国是权威的史书。但我曾经批评过“正史”：

“但其实‘正史’存在许多缺陷。例如‘正史’从《汉书》立《酷吏》、《佞幸》二传以后，《后汉书》、《魏书》、《北齐书》、《北史》、《隋书》、《两唐书》、《金史》等均立《酷吏传》^⑯，而《宋书》、《南齐书》、《北齐书》、《南史》、《北史》、《宋史》、《金史》、《明史》等均立《佞幸传》。读‘正史’和利用‘正史’的人都习以为常，却并不追究，既立《酷吏传》和《佞幸传》，为什么不立《暴君纪》和《昏君纪》？在我国历史上，酷吏和佞幸当然很多，但暴君和昏君何尝会少？而且暴君和昏君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又岂是酷吏和佞幸可比。这实在是‘正史’的极不公正之处。”

《一百三十篇》中的先秦卷篇当然不是信史，而从此以后，“正史”中也都存在不是信史的内容。但《遗珍》显然与众不同。“珍”见于《说文》卷一：“宝也”。张衡《西京赋》说：“攒珍宝之玩好”。所以列于《遗珍》的都是珍宝，都是十目所视的实物，它比文献无疑具有更高的价值。我们当然无意贬低文献价值，包括“正史”在内的大量文献，它们的价值仍然是不容低估的。但文献的数量甚大，按韩长耕的计算^⑰，中国古代文献，包括现存的和有目无书即散佚的，大概不下十五万种，而其中尚存世流传可供披览检证的，也仍在十二万种以上。这中间，当然存在不少牵强附会和信口开河即时下称为假冒伪劣的东西。即以绍兴为例，《越绝书》是一种众所公认的珍贵文献，但明末人钱軫（稚茁）即伪造过《续越绝书》二卷。据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七五所云：

“按《续越绝书》二卷，亡友钱稚茁避地白石樵林所撰也。其云书得自石匣，谓是汉吴平著，蜀譙岍注，盖诡托之辞”^⑱。对于这类文献，《四库全书》的编修者就感到忧心忡忡。《四库总目提要》卷六十六说：“軫与尊友善，所言当实。今未见传本，其伪妄亦不待辨。以其续此书而作，又即托撰此书之人，恐其幸而盛传，久且乱正。又恐其或不能传，而好异者耳闻其说，且疑此书之真有续编，故附订其伪于此，释来者之惑也。”《提要》的这几句话，说明对于后人仿造的文献，不论传与不传，都会在学术界制造干扰。

实物当然也有赝品，即通常称为“假骨董”的东西。中国的假骨董，不仅骗了中国人，而且也骗过外国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初，热释光测年的科学技术开始运用，这是一种对陶瓷器测年的非常可靠的手段。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以其所藏的九件六朝陶俑，作了这种测年鉴定，结果其中有六件赝品^⑲。1972年，他们又以所藏的二十二件辉县陶作了这种释年鉴定，结果全是赝品。几年

前，良渚博物馆一位领导在舍下谈起，眼下以玉琮为主的良渚假骨董充斥市场，有的几乎可以乱真。假冒伪劣之及于文献、骨董，由来已久，此事当然有伤文化，只不过是让不少不学无术而又心慕风雅的官员和富商们开了一扇方便之门而已。

《越地遗珍》所收录的都是实物，而且都是货真价实的人间瑰宝。此书分《绍兴县文物藏品鉴赏》和《绍兴县文物保护单位解读》两部分。前者包括“玉石器”、“青铜器”、“陶瓷器”三大类，当然都是现场出土经过专家鉴定或科学测年的，并且还可以和有价值的文献相印证。以青铜器为例，这是继玉石器时代以后而见诸正式文献记载的珍宝。《越绝书》卷八记载的是越王句践时代的事：“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渎至炼塘”。在这项记载中，诸凡冶铸工业的燃料基地，燃料的运输路线和冶铸工业的布局等，都非常详明。近代陆续出土的于越冶铸的青铜剑，如“越王剑”、“越王旨者于赐剑”、“越王之子剑”、“越王兀北古剑”^{②0}等，都已具有高度的冶铸技术。而1965年在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附近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句践剑”，无论在冶铸技术和艺术加工等方面，都不愧为一件精湛的作品^{②1}。这种以武器冶铸为主的手工冶金业的继续发展，使这个地区成为从汉代到三国的全国铸剑中心。日本学者梅原末治曾对这里出土的建安二十五年（220）和黄武五年（226）的神兽镜作了精研和盛赞^{②2}。此后，这类铜镜，包括神兽镜和画像镜，在柯桥、南池、皋埠、东关、富盛、漓渚等地，都有不少出土^{②3}。

散布相当普遍，数量非常庞大，鉴赏很有价值的“越珍”，还可以举陶瓷器的例子。越地的陶瓷业发轫极早，《水经·渐江水注》记及：“州郡馆宇，屋之大瓦，亦多是越时故物。”说明于越烧制的屋瓦，到汉时仍然存在并且利用。绍兴是我国生产瓷器最早的地方，在历来的考古发掘中，今会稽山丘陵以北，窑址比比皆是，这就是我国最早出名的越窑^{②4}。产品主要是青瓷器，日本著名陶瓷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三上次男曾在埃及开罗南郊的一座中世纪城堡福斯塔特从事瓷片发掘，从1964年起的几年中，发掘出中国瓷片一万二千片。他在其所著《陶瓷之路》^{②5}一书中说：“其中特别多的是越州窑瓷”。从唐代起，越窑青瓷成为全国瓷窑中的极品。茶圣陆羽在其所著《茶经》（卷中）中曾把越瓷与另一种著名的邢瓷（河北邢州所产）对比：“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唐人诗中推赞越窑青瓷的作品甚多，如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②6}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中描述越窑青瓷：“这种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②7}。值得鉴赏的越珍实在太多，限于篇幅，就不再赘举了。

《遗珍》的另一部分是《文物保护单位解读》。包括“古遗址”、“古墓葬”、“石刻及造像”、“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五类，都是经过专家考证和政府明文规定的。其所以需要“解读”，因为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各有一番卓越不凡的来历，不是大家都懂得的。例如有“白玉长堤”美称、属于全国文保单位的“古纤道”，以我个人的外事活动回忆，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陪同国际汉学家或其他学者参观的就不下二十次。这些国际学者之中，包括当时继费正清（J·K·Fairbank）以后担任美国亚洲学会主席的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曾获皇家奖章的日本地理学界元老米仓二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等。其中米仓在当时已经年逾八旬，却不顾步履艰难，登上这条水中央的纤塘摄影留念。我陪同外国学者到这里参观，每次都用自己的“解读”——“交通博物馆”。这是因为在不过二三百米的跨度之间，并列着从萧山到绍兴之间的四个时代的四条交通路线：公元四世纪的漕渠（西兴运河），公元九世纪的运道塘（古纤道），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公路，

三十年代的铁路。这种现象世界罕见，在中国或许是唯一的。所以外国朋友们都很赞赏我提出的“交通博物馆”这个称谓。当然，让他们叹为观止，临别都感到依依不舍的，还是这条“白玉长堤”。

《越地遗珍》的篇幅已经不小，但它所收列的，其实还只是越地历史文化中的一小部分。至于我在这篇《序》中所论及的，更是浮光掠影而已。太史公的《一百三十篇》为我国的历史研究开创了一个世代遵循的凡例，而随着时代的嬗递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相关学科都介入了这门硕大无朋的学问之中，《遗珍》就是多学科研究的杰出成果。《汉书·司马迁传》说：“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对于《越地遗珍》实在也是一样。所以海内外越籍人士，值得人手一编。“家有弊帚，享之千金”^{②⑧}。何况《遗珍》毕竟远胜“弊帚”，是越地的历史光辉。

陈桥驿

2006年12月于浙江大学

注：

- ① 《报任安书》，《文选》卷四十一。
- ② “太湟”，“湟”，《集解》：徐广曰：“一作湿”。案会稽从无“太湟”地名，或以“湿”为是。《水经·沔水注》：“东南地卑，万流所凑”。“太湿”或是一片湿地的称谓。
- ③ 杜佑《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水经》所云河出昆仑者，宜出于《禹本纪》、《山海经》；所云南入葱岭及出于南山者出于《汉书·西域传》。而酈道元都不详正”。
- ④ 胡渭《禹贡锥指》卷十三上，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卷一，都仍持“黄河重源”之说。
- ⑤ 《古史辨》，北平朴社民国十五年（1926）出版。
- ⑥ 参见拙作《论学术腐败》，《学术界》2004年第5期。
- ⑦ 《绍兴史纲》，傅振照著，2002年，百家出版社出版。此《序》又载于《学术界》2002年第6期。
- ⑧ 参见拙作《浙江的历史时期与历史纪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 ⑨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英文），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1936年出版。中译本，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 ⑩ 《大禹研究》，绍兴市社科院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 ⑪ 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
- ⑫ Cultural Dialogue（《文化交流》）第22辑，1996年10月。
- ⑬ 此二图又转载于《绍兴简史》，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 ⑭ 《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
- ⑮ 民国十年（1921），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又将《新元史》列入“正史”，故增为《二十五史》。
- ⑯ 《一百三十篇》中也有《酷吏列传》。
- ⑰ 《中国编纂文集之始和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的研究与流传》，《韩长耕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出版。
- ⑱ 参见拙著《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 ⑲ 王维达《从欧美市场上的赝品谈起——热释光年代技术》，《科学画报》1978年第7期。
- ⑳ 陈谦《越王句践の剑》，《人民中国》（日文版）1973年6月号别册。
- ㉑ 同上。
- ㉒ 梅原末治《绍兴古镜聚英》，日本京都文星堂影印本。
- ㉓ 张拯亢《续绍兴出土古物调查记》（手稿本），原藏绍兴鲁迅图书馆。
- ㉔ 胡行之《越窑秘色器研究》，《绍兴史迹风土丛谈》（钞本）第八册，浙江图书馆藏。
- ㉕ 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初版。中译本，胡德芬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 ㉖ 《全唐诗》九函十册：《秘色越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下册第1585页。
- ㉗ 胡德芬译本第27页。
- ㉘ 曹丕《典论·论文》。

概述

绍兴县位于钱塘江口以南、宁绍平原西部，南接峰峦起伏的会稽山，北濒碧波浩森的杭州湾。境内河湖纵横，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绍兴在夏王朝初期，是大禹朝见诸侯，传政治国的重地。自夏少康封无余为於越先君，建立越国，到秦统一全国，这里一直是越国的都城或於越部落的活动中心。秦朝实行郡县制度，始置山阴县。南朝·陈时起，分设山阴、会稽二县，实行同城而治。民国伊始，合二为一，统名绍兴县。绍兴自东汉永建四年（129）以来，向为会稽郡治、越州州治、绍兴府（路）治、绍兴市（专署）治所在地，故“绍兴”之名，既泛指该地域的郡、州、府、市，亦专指历史上的越国都城所在地及山阴、会稽和绍兴县。

绍兴县历史悠久，人文渊薮。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早在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今杨汛桥镇江桃村寺前山，就有於越先民筚路蓝缕，繁衍生息。距今5000-4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绍兴的聚落遗址增多，代表性的有马鞍镇寺桥村仙人山、凤凰墩遗址。该遗址中所出的石耨刀，体现了犁耕农业的发展；玉管、玉环及大量陶器，代表着当时琢玉、制陶工艺的较高水平。商周时期，有比较典型的齐贤壶瓶山、安昌后白洋遗址，其文化面貌真实地再现了越国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发展轨迹。

春秋战国时期，是越民族突飞猛进的时期，越王允常“拓土始大，称王”，为其子勾践称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位于兰亭镇的印山越国王陵，经发掘，其墓室形制、结构、规模等均为全国所罕见，结合文献记载，应是允常安葬之地。其时，越国出于生存及对吴战争的需要，推行耕战政策。因此，冶金业和陶瓷业都十分发达。冶金业以铸造农具和兵器为主。农具按用途分起土、除草和收割三类，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刃部带锯齿的耨、镰；兵器则以青铜剑最负盛名。“越民铸宝剑，出匣吐寒芒”，质量上乘的越剑成为列国有口皆碑的宝器。陶瓷业主要烧造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迄今已在富盛镇倪家楼村平湖山、富盛村渡桥头山等地发现战国窑址多处，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更是不计其数。当时的印纹硬陶多为坛、罐类盛贮器；原始瓷除碗、碟、盅、杯类饮食器和罐类盛贮器外，还有鼎、盂、壶、甬钟等仿铜礼器。越国的陶瓷工艺成就，独辟蹊径，影响深远。特别是原始瓷器，更是越窑青瓷诞生的前奏曲。此外，在印山越国王陵及贵族墓葬中发现的玉镇、玉璧、越王不光玉矛、玉墩、玛瑙环、水晶串饰等礼仪器和装饰品，造型之优美，纹饰之精细，亦令人叹为观止。

秦汉时期，地方政权采取推广铁制农具和兴修陂塘堰闸等措施，对这里进行有效开发。著名的鉴湖，溉田万顷，就是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郡守马臻主持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随着农业的发展，刺激了手工业产品的改良和创新。其中最古老的陶瓷业，终于在东汉晚期由原始瓷步入成熟青瓷的门槛。与制瓷业并驾齐驱的还有铸镜业，会稽郡治山阴县，是当时江南地区的铸镜中心。所铸的神兽镜、画像镜和龙虎镜等，精工绝伦，流传甚广，在我国冶金工业史上熠熠生辉。三国·吴时，铸镜匠师还东渡日本，传授技艺，成为早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六朝时期，我国北方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不安，而会稽郡在南方则相对平静。经过当地人民与南下流民的共同开发，这里很快形成了新的财富之区。当时的山阴县被史书称为“民户三万，号为天下繁剧”。故今绍兴县大部分镇、街道的山坡土丘上，均有古墓葬分布。这时，越窑青瓷也蓬勃发展，绍兴、上虞等地窑场遍布，富盛镇的青塘青瓷窑址便是典型之一。越窑产品既有碗、碟、罐、壶、盆、钵、簋、盘、耳杯、熏炉、灯、唾壶、虎子、砚、水盂等实用器，又有水井、鬼灶、火盆、鸡笼、猪圈、狗圈、磨、筛、堆塑罐等随葬用的明器。其形式多样，装饰华美，胎骨坚致，釉色青绿，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崇尚佛教，各地掀起了凿窟造像的第二次高潮，柯岩、羊山造像应运而生。它们或凭石造型，或依山取势，均法相庄严，气势雄伟，成为绍兴宗教文化兴盛的象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炉火纯青，走向鼎盛，平水镇的上灶官山窑址，即为重要实证。越窑产品种类丰富，用途广泛，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等应有尽有。不但被陆羽的《茶经》誉为全国第一，而且成为诗人们竞相吟咏的对象。唐王朝为了扩大对外贸易，还将越窑青瓷大批运销亚、非各国，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绍兴曾为南宋王朝的临时都城，时达1年零8个月。后虽迁都临安，但仍以绍兴为陪都。南宋自高宗以下六帝、北宋哲宗孟后、徽宗及后妃均葬于会稽宝山，后人统称宋六陵。陵区占地2.24平方公里，规模之大，在江南绝无仅有。这一时期由于越窑衰落，龙泉窑青瓷、江西景德镇青白瓷等窑口的产品源源打入绍兴市场，这在墓葬清理中多有发现。

明清时期，绍兴县境内遗存的石构和木构建筑数量众多，无论是其内在结构还是外观形态，处处散发着古越文化的芳香。石构建筑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桥梁。地处浙东古运河柯桥街道上谢桥至湖塘街道板桥段的古纤道，全长7.5公里，设计科学，工程浩繁，韵味无穷，宛若水上白练，堪称我国河工建筑的孤例。坐落在柯岩阮三村的太平桥，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大小船只通航、行人往来及背纤等需要，是河网地区一桥多用的代表作。位于陶堰镇的泾口大桥，拱桥采用薄墩，既利于泄洪和水运，又使桥型变得轻盈飘逸。除石桥外，属于纪念性建筑的石牌坊亦有遗存，典型的有陶堰镇秋官里牌坊、孙端镇樊浦牌坊、柯岩街道秋湖牌坊等。它们均用材粗壮，气势恢宏，雕刻精致，成为研究明清门楼式石构建筑工艺之珍品。

这一时期的木构建筑主要分府第民宅和宗祠庙宇两类。府第民宅，如陶堰镇的南野堂，建于明嘉靖年间，布局对称，用材硕大，为绍兴明代官宦建筑之典范。又如湖塘街道的德兴台门，建于清嘉庆六年（1801）。其特点是廊轩、梁枋、门窗之上，多精雕细刻人物、动物、花鸟图案及吉祥文字，对古建筑工艺的研究和鉴赏价值尤大。宗祠庙宇，如王坛镇双江溪的舜王庙，现存建筑为清咸丰、同治年间重建，以石雕、木雕、砖雕“三绝”著称于世，被誉为江南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又如王坛镇蒋相村的蒋氏宗祠，建于清康熙、乾隆年间。其门厅与第二进之间，以戏台、过廊屋脊相连的形式，反映出绍兴半山区建筑手法与风俗特色。

明代名人墓葬在绍兴县兰亭镇亦有两处：其一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墓；其二为青藤画派始祖徐渭墓。它们均已跻身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行列。

近代，国家积弱，民族危亡，秋瑾、陶成章、陈伯平等仁人志士，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组织光复军，策划浙皖起义，光辉业绩，可歌可泣，彪炳史册。他们的祖居、故居至今仍为人们缅怀凭吊。现代大文豪鲁迅外婆家朝北台门、“和平老人”邵力子故居等名人史迹，均得到了政府的妥善保护。

数千年的辉煌，使绍兴于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目前，绍兴县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0处；县级文物保护点28处；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2处。绍兴县更有文物藏品50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34件，二级文物90件，三级文物196件。此外，经多次历史文化遗产普查登记的文物史迹达350余处。人们称之为“文物之邦”，当之无愧。

让更多的人了解绍兴县的历史，感受先民的智慧结晶和文化足迹，我们特撷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馆藏文物精品，编成《越地遗珍》图录。其间凝聚着几代文博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同时也是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绍兴县文博事业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真诚回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来守护文化遗产，上无愧于祖先，下造福于子孙。

遺珍

地

Cultural treasures unearthed
in shaoxing county



- 012……富盛窑址
- 014……马鞍古文化遗址
- 016……壶瓶山古文化遗址
- 018……后白洋古文化遗址
- 020……青塘青瓷窑址
- 022……上灶官山越窑

古遗址



Ancient ruins

富盛窑址

Fusheng kiln site

富盛窑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县富盛镇倪家漍村长竹园和诸家山等地。此地燃料充足，瓷土丰富，水陆交通便捷，为开辟窑场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窑址分布面积近4000平方米，堆积层厚约1.5米，地表散布着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陶碎片以及扁圆形托珠、红烧土等。经考古发掘，该窑址有多座叠压窑床，系我国早期龙窑。窑室较矮，有拱顶，窑墙和窑底都用粘土做成，比商代和西周的窑炉有较大改进，不仅烧造温度高，热能利用充分，使产品质量得到提高，并且装烧量大，有利于降低成本。

该窑系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同窑合烧。在出土器物中，原始青瓷多为饮食器皿，品种有碗、盘、碟、钵和器盖等，质地细腻，多数呈灰白、灰色。器形规整，内底有一圈圈细密的螺旋纹，系轮制成型，外底有线割痕。器物内外施青黄色薄釉。印纹硬陶都为坛、罐一类盛贮器，器形高大，口沿外卷，圆肩深腹，平底，外印米筛纹、杉叶纹、米字纹、麻布纹、席纹和回纹等。这些坛、罐多数胎骨坚硬，叩之铿锵有声；少数则为砖红色，胎质较疏松。器物的造型与装饰均具有战国时期特征。

富盛窑址规模宏大，产品精良，为绍兴越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窑场。它对于进一步研究春秋战国窑业生产状况和龙窑技术发展史有重大价值。

